



# 「人文風景」的建制與開展—— 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紀要

高嘉謙\*

如果人文學科的跨領域對談是臺灣人文研究的發展趨勢，而這樣的發展也足以漸進改變人文學科的生成本質和環境，那麼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從去年成功舉辦「文與體」學術研習營，藉由法國和臺灣兩地學者的不同思考路徑，開啟了一次關於人文主體與概念形式的糾葛、生成、詮釋過程的跨界思考。儘管學者專業不同，但透過語言、文字、文體、身體、風景和文本等不同層面的思辨，替人文學科長期關懷的核心議題，示範了一次有趣的思路整合和拆解，留下意猶未盡的討論。有了一次成功的跨界對談，我們注意到跨領域對談的研習營模式對人文學者和研究生帶來了不同於一般研討會的思維啟發和激盪，在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鄭毓瑜教授的堅持和推動下，邀集蔡淑玲、賴錫三、龔卓軍、黃冠閔、高嘉謙和許暉林等學者協助籌備，以「人文風景」為主調的學術研習營在本年度有了不同的延續形式。在賴錫三教授領導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師生團隊的全力籌辦下，研習營從去年的臺南移師到嘉義，於2013年10月24-25日圓滿舉行。除了延續臺法兩地學者跨領域、跨學科對談的主軸，兩天會議設計了兩個不同的討論形式。首先以文學與哲學領域的交流，邀約二位法國學者和六位臺灣學者開啟中、法語系觀念的對談，建立風景、詩學、行動和裝置藝術等不同議題的思辨路徑。接續則以不同專長的九位青年學者為主的一次對話，他們的專業含括經學、文字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境外詩學等領域面向，經由事前的討論和共識，形成三個不同的子題：「越界與互文性」、「權力與異化」、「文化、詞語與身體的互文詮釋與實踐」，試圖以彼此的研究視域進行方法論和詮釋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思路的互涉和對話，形成一次有趣的人文學科跨領域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中正大學中文系還同時籌劃了四位藝術家的聯展，在研習營開幕前夕把學者們帶入到氣氛優雅，討論熱烈的藝術雅聚，體現了人文學科在思想激盪外，並不欠缺雅興和感性。

第一天的對談由法國巴黎十大哲學系的亞蘭·米龍（Alain Milon）〈風景與混織：自然方案的問題〉開始，他從一個習以為常的自然概念，提出人與自然並非二元對立的本體論關係，我們對自然所做的大部分解讀都受到主客關係的存有論原理所規定，故人與自然的表述需要重新界定。因此「自然方案」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複雜連結，其中的思考邏輯：風景當作鑲嵌在自然方案（自然平面）中的一個運動。風景變成是模態變化、平臺、系列，風景如同人，被鑲嵌在此平面中。如此一來，風景既是人的製造，也製造人。他進一步提出風景不再是被人抽離自然本性的風景，在人／自然的關係中，應該接受「風景被自然所混織」的觀念，也接受「風景解釋一個恆常運動」的觀念。混織不成立於兩種或更多種不同元素的混合，而成立於此混合所仰賴的一種內在性中，尤其當此內在性表達了個體自己的他異性。換言之，他最後提醒「混織的風景」並非指它是一種組合的成果，而是一種異質性的表達，其主要任務是解釋一種同時既遠又近的內在性，要讓風景伸張它的混織狀態，讓人去承擔他的此自然方案中的地位。

相對米龍提出的「自然方案」，黃冠閔擔負口譯和對談人的角色，他提醒風景既是被建制者（被制定者），也是建制者（制定者），以物質建制、身體建制、意義建制的三重方式成立。換言之，他從風景建制的角度進一步開啟對風景的探問。面對風景，除了眼睛的構造外，還有時間差距（例如光影的變化）和場所差距（身體的移動，視覺的環視的掩蔽）作用。二者不平衡的交錯關係，讓我們對風景的必然性產生質疑，刺激了風景體驗的敏銳。因此，風景不是既定的實在，每一個風景體驗也將重塑著風景的實在。黃冠閔更進一步指出，關於風景建制和差距的思考，讓我們更清楚意識到風景的脆弱性。無論是動態風景的轉瞬即逝，人為風景也難逃人類脆弱的本性，但與此同時，我們更能夠將風景問題化，尋求描述各種條件與各種問題的方法，探問我們自己存在的條件，因為我們也在風景中。

關於自然和風景的思辨，直探「人文風景」的核心概念。但文學形式的律動與節奏，則揭示了物質、形式和語言之間，現代主體如何「創作」與「創



造」(créer)。這是蔡淑玲在第二場對談報告的議題〈自然律動與內在環境：論左拉創作主體的局限與節奏〉。她提出左拉以科學實驗方法反省文學藝術的創作，探究文明與自然之間的互動法則。左拉的實驗小說方法，援引貝納克羅德(Claude Bernard)的實驗醫學方法，二者有著相同的哲學理念，以自然律動為前提，分析物質條件如何顯現內在特質的形變。在自然律動中，左拉強調創作者個人的貢獻在於：找到一種語言，創造一個形式，表現實驗得出的法則。但關鍵在於捕捉真實強度、因身心所感，震力所頓，因體悟而自然產生界說創形的表現。

蔡淑玲提醒我們注意小說家如何透過實驗，提出自然與社會之間互動形變的規律。這是法國文學個案關於自然律動與文明疆界的思考。而在中文世界，陳世驥翻譯〈文賦〉而關注「姿」字，從生理自然的角度的角度，提供情感表達上身／心相應的動作趨勢或姿態，這個發展可以說是從本源與本質的角度，讓新詩音節的討論，在語文實踐的這個基點上，追溯一個身心感發的全面姿態。這是鄭毓瑜以論文〈新詩音節與「卍」之的譬喻：陳世驥論姿態、節奏與創作〉展開的議題。她認為陳世驥是透過翻譯、詮釋陸機文賦起始，到探討屈原的時間概念為止，深入探討了文學作為在時間中生成的事件，「作詩」與「感時」如何透過系列對偶詞所提示的多層次往復，完成身與言的動態實踐，從而在流轉的瞬間「完全獲得自己」，也正是在創作過程中掌握「最富意義的時刻」。

鄭毓瑜對陳世驥姿態節奏說的探究，背後關注的顯然是新詩發展以來的音節、節奏問題所延伸的複雜提問：在語言音／義所構成的節奏之外，宇宙之身與個體心志間如何連結？這又會是什麼樣的詩節奏？在形式律動的意義上，鄭毓瑜和蔡淑玲在不同個案上開發了可能的比較脈絡和觀點。

第三場對談以莊子從學術專業走出，進入創意思維，開啟了另一種有趣的思辨模式。賴錫三的〈莊子遇上黃色小鴨的人文風景：遊戲、童真、倫理召喚〉一文從風靡臺灣的黃色小鴨，提出道家的倫理性需要重新討論。他指出黃色小鴨所代表的萌經濟、萌消費，以童真救贖成人。這跟莊子進行形上學的顛覆，與物相遇，與物相遊，那是主體轉化的工夫。放下成人利益之眼，轉換成天使般純真的眼、兒童般遊戲的心。因此，黃色小鴨召喚童年遊戲經驗，這裡跟莊子思維相近的有「轉小為大」的變形法術或顛覆能力，以及「無用之大用」的想像超越或遊戲能力。因此，當小鴨變大鴨，其形體之小大

之變，召喚主體心境的小大之變，成人膨脹的主體卻可能淡化而變小。當霍夫曼將黃色小鴨給變大、將成年人給變回孩童時，此時的維多利亞和高雄這兩個經濟利益甚囂塵上的商業大港、交通要塞，頓時也轉化為一群大孩子們的大浴缸、遊戲場。換言之，原本效益取向的交換商港、交通樞紐，暫時都轉化為無用之大用的「人文風景」。賴錫三因此強調，黃色小鴨所在的港灣營造了一個親密而不疏離的倫理共在時光，遊戲既是充滿力與美的開顯也將萬物捲入難分難捨的倫理密度中。

然而，對於賴錫三以莊子的道家思維看待黃色小鴨的策略，宋剛則以當代公共裝置藝術的角度反駁了其中必然對應的現實脈絡。壯美、宏偉是公共裝置藝術的常態，龐大的黃色小鴨並不例外。其中更涉及現實的資金籌措，周邊商品化現象的經濟議題。由此可以發展出相關的提問：從資本主義批判小鴨，也可是回歸的鄉愁（回歸童真的鄉愁），個體自我認同為主。那是對自我的召喚？倫理召喚的實質在哪裡？莊子的童真命題跟黃色小鴨是否有倫理共享的本質？當黃色小鴨作為公共藝術，有何倫理的召喚？當凝視和觀看方式不同，是否意味著地景的改變？小鴨進入港灣，召喚群眾重新想像城市景觀？從黃色小鴨到莊子，倫理與風景的思辨路徑，形成熱烈又有趣的第三場對談。

第一天的最後一場對談，是巴黎第一大學藝術系教授帕絲卡·韋伯（Pascale Weber）和龔卓軍的創作報告。帕絲卡·韋伯從福島災變的現實原型，以夢境的靈感，做出一個「睡蓮芭蕾舞」（*Nymphaea Alba Ballet*）的3D影像作品，意圖處理氣候災難，呈現生命體的連續性。這件作品聚焦於身體與風景關係。身體帶我們能夠進入不同風景的載體，她嘗試處理身體在風景內的位置和出場。她同時藉此反思和觀察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的互動方式。那些穿透身體的力量如何構造和交結，身體的參與和在場，如何彰顯其張力。透過什麼方式讓這些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藉由此作品，她提醒風景概念令人不安，親身在場卻有一種非觀看性的參與。

相對帕絲卡·韋伯的數位多媒體的藝術裝置，龔卓軍從公共藝術的地景與人文風景，景觀社會／裝置的角度提出反思。他以〈廢墟、風景與記憶：臺灣當代環境藝術案例〉，提出臺灣裝置藝術如何關心人和風景的關係。從倫理美學角度去看待風景，福島核災產生於亞洲歷史。而臺灣的廢墟也帶來裂縫、碎片，是亞洲歷史的地景。他以高俊宏將 John Thomson（1837-1921）拍



攝的臺灣早期風景照片《荖濃溪的鵝卵石》，彩繪在廢墟牆壁上的跨界藝術為例，指出臺灣歷史的集體記憶。藝術家在斷裂的基礎產生創作的動力。當歷史照片銘刻在廢墟牆上，歷史空間的被遺忘，被埋藏在這些空間、廢墟裡，藝術家在進行恢復記憶的工作。廢墟與圖像的交會讓記憶活起來。他進一步提出反思：亡靈銘刻在廢墟，召喚鬼魂，如何被看見？招魂如何形成公共的力道？因此身體的在場是關鍵問題。藝術家不直接去再現歷史，而是行動本身的在場。一個人的生命因此被改變，恐怕都無法再現，只能在場。研習營第一天以臺法藝術學者的對談結束。

從哲學概念的辯證與深化、裝置藝術的倫理思維與資本主義批判、文學與創作形式的語言和方法論反思與脈絡化，以及歷史記憶的藝術銘刻與自然的關係美學的地景建構，研習營第一天以跨學科的相互對話與激盪，議題看似紛呈卻是經過策劃與安排的對談，凸顯了人文風景的多元交織，間接也改變了學者間的思考立場和策略。這是人文學科跨出本位思考的重要起點。

第二天的對談場次，以九位青年學者的三個子題開展。首先登場的是「越界與互文性」，邀集了李承機、陳國偉、高嘉謙就互文性的方法論與實踐展開討論。李承機以〈作為方法的「互文性」〉揭示互文性在學科間相異研究領域及研究材料之間存在某種方法學上的可能性。他以殖民地臺灣的社會認識論考察對象，提出思想與知識的「互文性」關係，嘗試探究「互文性」如何與特殊社會條件連結，並指出那是一種理解與解構某個特殊時空環境與社會條件的方法。然而，他也尖銳指出當「互文性」作為一種連結的方法時，一方面可以讓思想與知識的連結或解讀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卻也可能讓特殊的「互文性」連結產生解構的效果。但當「互文性」被當作一種無限擴張的連結關係時，其實也會失去其方法論上的作用，如同單一文本被依照不同的「互文性」進行解讀時結果便會產生不同，若「互文性」的開放僅僅造成詮釋學有無限多種可能性時，就只會單單成為詮釋競爭的場域。這是互文性作為方法論的反思。接續陳國偉和高嘉謙分別以不同的個案現象展開對互文性作為方法的不同實踐。陳國偉以臺灣大眾文學中的身體互文，指出臺灣推理類型小說的怪物異質身體跟日本推理小說的互文關係，其中涉及的文化翻譯和臺日對科學的共同態度，揭示了對於「異質身體」的厭棄與恐懼，反映出在臺灣近代歷史進程中，與國家權力抗詰與協商過程中，對於秩序性「現代身體」的期待與焦慮。相對類型小說的互文脈絡，高嘉謙則以漢詩的互文脈絡，透過下南洋和

跨太平洋的海洋視域，解釋知識人不同移動路線，及其漢詩寫作潛在的對應特徵，跳脫以往僅局限於名家個案的海外詩、華僑詩的認知範疇，建構流動間前後交織互文的詩學網絡，以及具有參照意義的離散詩學脈絡。

第二場的主題是「權力與異化」，劉瓊云、陳相因、許暉林分別在戲曲、小說和散文等不同文類建立對話的可能。劉瓊云以明清之際蘇州派作家朱佐朝的《血影石》傳奇為例，探討「靖難」事件後物的象徵如何作為記憶的場所。依附在《血影石》而存在的歷史記憶圖像，其中的銘刻與遺忘，《血影石》選擇的迴避和發揚，這部傳奇因此可能改動了清初「靖難」記憶的圖景和色調。相對歷史記憶的辯證，許暉林則以中國傳統視覺經驗的衝擊和轉變，探討自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晚期之間從西方傳入中國的視覺裝置（「千里鏡」和「X光鏡」）如何在小說與報章雜誌報導等敘事文類中被呈現。透過有主宰性的以「鏡」為中心的話語所轉譯／義與理解，這些視覺裝置在敘事中被再現與想像的方式的源頭與變化過程，指涉了中國「視覺現代性」的形塑過程背後所牽涉到的傳統隱喻元素，以及認知框架的運作方式。最後將場景拉到二十世紀，陳相因以瞿秋白筆下「多餘的人」與〈多餘的話〉，試著聚焦在中國與中共內外的「政治舞臺」上，瞿秋白如何認同與繼承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多餘的人」的傳統，作為自己在文壇與政壇的起點，最終又是如何在自己一個人的文學舞臺上寫下〈多餘的話〉，用以結束另一個自己處在「千萬人吾往矣」舞臺上的政治生命。以上個案都涉及處理歷史記憶、知識話語和自我形象的權力運作和異化過程，在不同方法論的探究意義提供了對話的可能。

研習營最後登場的主題，則以「文化、詞語與身體的互文詮釋與實踐」回到一個先秦禮儀、儒家身體觀和甲骨出土文獻的詮釋脈絡。林素娟從先秦的具體儀式情境中，討論開啟身體之體驗，並透過情感及身體知覺的涉入，使得原有的文化系統產生新的連結的可能性。她同時透過先秦禮儀論述中以詩詮禮的探討，說明禮儀的精神，並重新思考禮儀與「民性」的關係，希望以情感之體驗與實踐之角度，重新回應自然、身體、倫理之課題，以展開充滿動力與情感的禮儀風景。林宏明同樣回到古代儀式，透過殷人占卜行為探討理性與迷信的衝突。他從殷墟卜辭甲骨的材料為基礎，重新檢視殷人對這些迷信行為的施行過程中，所遭遇到人身上與生俱來理性的挑戰。他以卜辭內容的齟齬和卜雨為例，強調在殷人迷信好鬼的傳統論述中，仍有殷人理性思考的成分值得注意。



在先秦儀式的探究之外，藤井倫明以日本德川時代朱子學者山崎闇齋和古學派代表學者太宰春臺為對象，將闇齋的「敬」說與春臺的「禮」說置於「身體觀」面向加以理解、思考和比較，跳脫兩派思想水火不容的既定印象，探究其中可能同樣體現著存在於日本文化底層的日本式思維模式。

以上三個議題的處理，無論禮儀、占卜和身心工夫論都涉及人身經驗，身體感顯然是主體。雖則議題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但藉此對身體觀的融合比較則可能鋪陳了迥然不同的思考策略和對話脈絡。這是「人文風景」學術研習營籌辦的初衷，藉由安排不同專業、資源與背景的學者對談，知識的流動與交織，思維模式的衝突與激盪，方法論的反思與碰撞，才有了鬆動人文學科界限，展開跨領域對話的可能。經過兩天研習營的洗禮，無論學者和研究生，都在思想的火花與問題的反響中有了不同的學術體驗。透過兩屆研習營埋下的跨學科、跨領域的對談火種，相信已在人文學科引起了不同的立場思辨與對話的可能。尤其臺法學者藉由研習營展開了長期延續性的討論和合作，刺激臺灣人文學者整合不同的問題視野，這是研習營模式帶動的最大學術效益之一，也是此次「人文風景」學術研習營的豐碩果實。